

洋务运动自强难强

清政府在“资夷力以助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威力，以为使用这些手段自救，就能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起，地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掀起了以建立制造“洋枪”“洋炮”和“洋船”等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兴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是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磅礴之势、捻军的蓬勃兴起、各地会党的风起云涌，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而镇压农民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实际，让洋务派官僚见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实力。同时，他们通过“借师助剿”的经历，认为相对于西方列强，农民起义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维持封建统治，乃是洋务派推进洋务运动的共识。

其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严重外侮的忧虑，也是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的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朝野上下原以为此乃“万年和约”，没想到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权益，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外，沙俄趁火打劫，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严重的外侮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震动。

最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破产，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瓦解，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一部分地主、买办、商人积聚了大量资本，

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形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洋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可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即以中国封建纲常伦理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其目的是利用西方的“长技”来维护和巩固中国的封建制度。“中体西用”最早是由冯桂芬在1861年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但是，洋务派受其阶级属性的限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去否定封建制度，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却又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于是，“中体西用”自然成为其应对统治危机的指导思想。

案例：洋务派代表人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楨、刘坤一、唐廷枢、张等。

奕訢：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

文祥：军机大臣。

曾国藩：两江总督（1860—1864），直隶总督（1868—1870）。

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张之洞：湖广总督（1889—1894）。

左宗棠：陕甘总督（1866—1875）。

丁日昌：江南制造局总办、江苏巡抚、福建巡抚。

沈葆楨：江西巡抚。刘铭传，台湾巡抚。

刘坤一：两江总督。

（三）洋务事业的兴办

历时 35 年的洋务运动，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初，是洋务运动的兴起阶段，以创办军事工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第二阶段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除继续创办军事工业外，主要兴办民用企业，重心转为所谓“求富”。第三阶段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洋务运动进入式微阶段。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

1. 创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军工企业是安庆内军械所，由曾国藩在 1861 年创设于安徽怀宁黄石矶、安庆大观亭，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也是清政府创办最早的以手工制造近代武器的军工作坊，主要制造子弹、火药、枪炮。科学家华蘅芳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1864 年迁往江宁（江苏南京）改建为金陵内军械所。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 5 个，即江南机器

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最有影响的军工企业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其存在的40多年间,为中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第一门钢炮,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机器工厂。湖北枪炮厂的设备是当时全国兵器制造工厂中最先进的。该厂生产的汉阳式79步枪,即“汉阳造”,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步兵的基本配置。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20多年中,洋务派倡导创办近代民用企业,主要涉及航运、煤矿、金属矿、电讯、铁路、纺织、冶炼等,构成了民用企业的主体。其中,影响深远的是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1872年由李鸿章招商筹办,是清末最早设立的大型轮船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烟台、牛庄、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和日本的横滨、神户以及吕宋(菲律宾)等地。

除了航运业务外,1875年11月初组建的保险招商局,是中国人自办保险业的开始。1875年,招商局请上海英国工部局技术协助,架设从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82年,投资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近代中国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11月,投资创设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2. 编练新式海陆军

洋务派从事的编练新式海陆军活动,最有代表性的是编练海军。

1874 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中国以赔款妥协。深为震惊的清政府着手筹办海防、建设海军，并于 1885 年 10 月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海军衙门)。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 20 多艘。

3. 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从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新式学堂 30 多所。主要培养翻译人才，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以及新式海陆军人才。

此外，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留学生，官费赴美、英、法、德等国留学。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第一批于 1872 年 8 月 11 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从 1872 年到 1875 年，清政府先后派出 4 批共 120 名幼童，他们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 12 岁。到 1880 年，先后有 50 多人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 22 名进入耶鲁大学，8 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 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 名进入哈佛大学。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产生了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更多的是像詹天佑一样为国家科学技术和工程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而又普通的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后的这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历经晚清社会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在近代企业中，还活跃着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科学家。他们运用学到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如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长期在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徐寿、徐建寅父子则为中国早期的轮船制造及军品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1862 年 3 月，徐寿进入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眼看当时外国轮船在中国的内河横冲直撞，徐寿十分愤慨，决心为中国制造蒸汽机。徐寿次子徐建寅还为汉阳兵工厂试验无烟火药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四）洋务派不能实现“自强”“求富”目标的原因

洋务派推进的洋务运动，建立了最初的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编练了区别于八旗绿营的新式军队，创办了传播科学技术的新式学校，派遣了留学生，并且拥有了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北洋水师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民用企业也是百弊丛生，没有达到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究其原因在于：

首先，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制度的目的，本身就具有不可相容的矛盾性。洋务运动是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优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物质层面落后，必须以西方之“器”维护中国之“道”，以封建制度为“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为“用”。事实上，洋务派引进的新的生产力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教育。

其次，洋务派企图依赖西方列强的支持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这一幻想不仅得不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反而进一步使其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目标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相违背。西方列强的目的，是将中国变成其商

品倾销地、资本输出国、原料掠夺地，即使容许中国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也只是为了更有利于它们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和原料掠夺，使中国成为其附庸。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真正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时，中国还没有机器制造工业，只能从西方国家购进机器设备，这就造成对西方列强的严重依赖。西方列强借此对洋务派官僚进行敲诈勒索，或者抬高机器的价格从中牟利，或者将落后甚至淘汰的产能转移到中国，迟滞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进程。洋务派依靠西方列强，无异于与虎谋皮、与狼共舞。故时人又议论曰：“夫名曰自强，而仍倚西人以为强，此亦必不可恃矣。”

最后，在洋务运动中还充斥着种种派系的利益争斗，使这一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为派系斗争所左右。洋务派不仅自始至终受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扰，其内部也分为若干派系，互相争斗。大的派系，有所谓湘、淮系之分，小的则更多。逐渐形成了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派集团。其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迹，各自成为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封建官僚集团。因此，他们希望在其统治区内经营起庞大的洋务企业，作为自己的资本。即使迁调他省，他们仍要遥控原来的洋务企业。譬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有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奏的事，须由他和两江总督会奏；左宗棠已远赴西北，福州船政局的重要事项，还要听命于他。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